

配合和融入

——新时代背景下的军事文艺琐谈

□黃國柱

王蒙写于“文革”期间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后来被他称之为“命题作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并没有人对他“命题”，布置他写作。完全是王蒙根据当时组织的号召，主动地为了“配合”时代政治要求而为。如果对比当年那些“三突出”、“高大全”的极左作品，《这边风景》无疑是相当出色的。其表现当时特定政治年代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故事具体、情节细腻、细节生动，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应该说是一部“配合”当时流行的政治理念的优秀之作。

王蒙的创作历程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命题：作家艺术家如何面对组织的要求和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潮流做好“配合”的文章。其实，这个命题的核心是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属于政治。革命的文艺要做革命事业的武器、工具、齿轮和螺丝钉。就是说，革命的文艺必须服从服务于革命的大局，努力配合当前的“中心工作”。许多以张扬艺术个性为标榜的文学艺术家，在抗日历史潮流的风起云涌中，放弃了自己的“个性”，走进了革命的队伍，成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文艺战士。丁玲、萧军、公木、刘白羽……莫不如此。然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去，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一味“配合”产生了怀疑，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观点相当地温和，强调的无非是“配合”是需要的，只是不要过于“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而已。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蒙冤多年。

值得我们深思和玩味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平反解放”之后，仍然坚持以自己革命文艺战士的历史定位而自豪。不同的是，他们对“配合”、对“中心工作”的理解更加深刻和丰富。对于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条件下的文学艺术道路，有了更多的历史沧桑感，多了几分“而今识得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厚重和深沉。这其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的家国情怀和政治信念。即便身处江湖之远，仍心系庙堂之上。他们视“配合”为使命，即使沦落到了“想配合也不让配合”的境地，宁可视之为宿命，也不会罢手停笔。

我军的军事文艺诞生于革命的烽火之中，始终与革命战争的大事业、大格局密切相关。一代又一代的文艺战士为了这支军队的成长发展壮大献出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乃至生命。尽管大家经历了一言难尽的“文革”岁月，但拨乱反正之后、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也为他们创造了尽情讴歌新时代伟大成就和精神风貌，奉献大量优秀作品的历史机遇。特别是今天的军队文艺工作者们，借助祖国强大、政治昌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东风，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也获得了非凡的荣誉和崇高的地位。

军事文艺是作为一支队伍而存在的，“配合”党、国家和军队的“中心”对于我们的创作还是十分必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王蒙那时候想配合不让配合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一点困惑没有。其中，影响“配合”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困惑还是“市场”。对此，评论家南帆说：“当下的文化领域……市场决定艺术家的报酬、声望和身价……文学的深刻正在演变为一种招人嫌弃的品质，严肃的经典已经留在昨天”。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消费主义倾向，积极主动地选择主流题材特别是重大主流题材的“配合”，既需要高明的远见、强大的定力，更需要敢于承受风险的市场预测力和强大的资金支持。因为若干年前那种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意识形态至上的创作行动，在今天

已经极为罕见，更多的作品既要通过市场来生产，还要经受市场的检验。娱乐化的文艺，并非没有一点“配合”的功能，但我们所指，是那种直接以“主流题材”“配合”面目出现的严肃作品。此类作品虽然有时不能直接地改造社会或者创造多少经济效益，但它却可以展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导向，改造和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有精神追求的人反过来又可以改造社会，创造经济效益。现实中多少利益的纠葛都在搅动着人们的心灵，而恰恰是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们一些灵魂的安宁和平静。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军事文艺的作用显然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审美手段来影响和浸润读者、观众的精神世界，进而充实人们的心灵生活，陶冶情操，提升境界。

张西南的《追赶军车：军事文艺的使命与光荣》（见《文艺报》2013年11月29日第6版）一文，强调了军事文艺创作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应该说很有针对性。要使我们的军事文艺在国家和军队新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好“配合”的作用，能够影响甚至“赢得”文化的“市场”，既不能一味迎合，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闯出一条具有鲜明军事特色的创新之路。解决包括公式化概念化在内的创作问题之前提，是对当前时代的理解和认识。这个理解和认识如果是准确的、深刻的、丰富的，那么解决创作上的许多问题，就有了坚实的理性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军事文艺工作者必须全身心地融入当前的时代和生活，用生动的感性支持清醒的理性认识。在网络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我没有再用“深入生活”这样的表述，正是为了防止受到简单化的理解甚至误读。

思想的融入。实践的自觉来源于理论的清醒。思想的融入首先是理论的信服。军事文艺融入当前的军队变革的伟大实践，首先是对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准确把握和认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新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段话信息量非常之大，需要我们所有军事文艺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理解。否则，无法去正确地“配合”。

情感的融入。对于日新月异的军事变革新生活，我们必须满怀激情地去热爱它、拥抱它，才能产生创作的激情和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文艺作品不需要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配合”，而需要深刻而独到的人生体验和独一无二的艺术表达。军队正面临深刻的变革，为了实现军队打赢未来战争的远大目标，即便对某些人是一种痛苦和牺牲，我们也要承受它、体验它、描写它、讴歌它。

生活的融入。“嫦娥”探月、跨国演习、航空母舰……新事物层出不穷，即便是边防海防、医疗卫生、编制体制等传统的领域，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拓展世界的视野，全身心“融入”现时的军队新生活，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融入全新的时代和更加复杂而又丰富的军队和社会生活中，深刻地洞察今天部队官兵及各阶层人们价值观的复杂变化和纠结。莫言说过，“文学的重要功能不仅仅是描写创伤，而且能够疗伤。”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熟悉和透彻的了解，既无法准确地写出“创伤”、“疗伤”更是无从谈起。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无疑是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去提振民族的精神，去影响更多的人同心同德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这是军事文艺的神圣使命，让我们为此而不懈努力。

周涛：在西域策马吟唱的“文学骑士”

□邢平安

在中国西域的苍茫大漠和无边无际的草原之上，一个俊朗的文学骑士扬鞭策马，绝尘而来。他游牧着五千汉字——他的羊群和野马群，吟唱着他的新边塞诗，挥洒着不拘一格的大散文。

近日，这个天马行空般自由自在的文学骑士，唱出了专属自己生命的歌——《周涛口述自传：一个人和新疆》。该书揭示了他的传奇故事，警句名言俯拾皆是，掩卷之后，你会获益匪浅。

拒绝戴假面具

当前，假面具成了中国一部分人不可或缺的生存至宝。但周涛不要假面具，他坦坦荡荡、真诚直率，这本第一人称的口述自传，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周涛。

他讲到自己22岁的初恋，说：“如果说以前我暗恋好几年的那个是幻觉，没有从肉体上吸引我，那么这个忽然让我产生肉体的反应……”周涛其实跟这个女孩儿有真情，热恋了很多年。但是，他因“文革”遭受了父母挨整、家庭不幸的人生坎坷，不得不“通过改变婚姻状态，寻求新的支撑点……那时候马文跟我住在一个楼上，天天见，也接触多，我才想起，这是一根救命稻草……当时这是带有某种机会主义的行为。”确实，周涛因与马文结婚而命运好转起来。

周涛口述自传的整理者是《南方周末》的资深编辑朱又可。他准确地评价了这本自传：“这是一部中外文学史上的另类自传，口无遮拦，自曝弱点，连自己父亲、妻子、情人的种种可笑可哀之事，亦毫不避讳；对自己的难堪、走麦城、人性暗夜，更是纤毫毕现”。

坦率真实的个性，正是成就周涛文学大业的根本原因。

诘问现代新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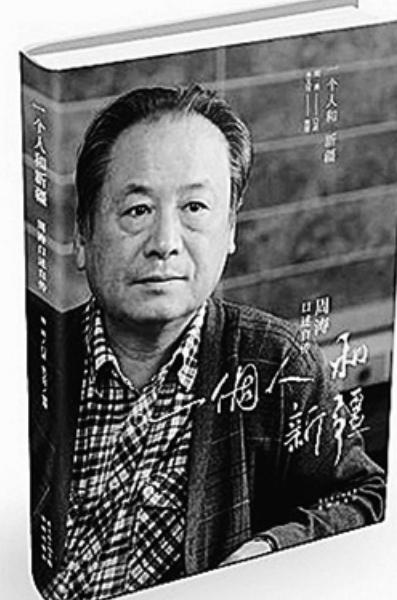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周涛就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一篇振奋发聩的《新诗十三问》，这在中国文坛无疑是一次强地震，引发了当年的大讨论。现摘录几问如下：

一、新诗兴于本世纪初，现在到了本世纪末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公认为合乎历史潮流的“诗界革命”，是否应该到了重新研究总结成敗得失的时候了呢？

二、新诗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婴儿究竟有没有联结于民族文化之母的脐带？

三、新诗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如果不错，为什么这条路越走越窄？如果错了，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大误会？

四、是诗这种古老艺术形式的末日呢？还是一群误入歧途的诗人的末日？



五、现代社会上流传的那些民谣是不是诗？为什么它们能不胫而走，诗人是否应该从中学习一些什么？

颠覆传统散文

周涛得益于“新边塞诗”，亦涅槃于斯。如果说，“新边塞诗”时期，周涛还是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新边塞诗”三人，像一窝青翠的竹笋，刚刚冒出地面，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青睐。几度春秋秋实，周涛长成了参天大树，兀立于天地之间，令文坛注目。他成就了诗歌的辉煌之后，转攻散文，再次呈现文学骑士的天赋与洒脱。

在周涛看来，当时赋予散文新的生机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贾平凹，另一个是曹明华。周涛认为，贾平凹的散文仍没完全摆脱“僵尸”的痕迹。“我当时是要完全摆脱那套，展现出一个全新的散文面貌来。全面铺张蓬勃的生命力，把散文写得张扬，纵横驰骋”。

当时的《中国作家》刊发了一篇周涛与《解放军报》记者的长篇对话：《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在全国文学界引起轰动。周涛给当今散文列出了八大病状，提出了“解放散文”的口号。

周涛的散文《伊犁秋天的札记》，写于1989年，是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力作之一。“这篇东西可以说尽得草原自由随意之魂，那个时候没人敢这么放肆地写散文，连我自己

写时也感到太过分了吧？这样行吗？但是写得舒心得意，就大胆写完了。谁教我的？咱不是学了什么国外名家，也没受什么思潮呀，文学流派呀的影响，怎么来的？草原与我，本性与我，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了《伊犁秋天的札记》。”这是周涛自己的创作心得。

《人民文学》原主编薛作实评价周涛说：“周涛是异常聪明的，他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线路，进入文学创作最薄弱的领域，竟然一发而不可收，以其作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几位散文大家之一。”

周涛文学现象

周涛的第一本长诗《八月的果园》出版于1979年。1986年，他的诗集《神山》获全国新诗奖。1990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出版。1995年，《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后仅隔5年，周涛就跻身现代散文名家之列。

周涛也成了一只“稀世之鸟”。

莫言读了周涛的《稀世之鸟》后还专门给他写了信，表示赞叹：“有了这个还写什么小说，你打破界限了。”周涛散文的细节描写完全像小说。

贾平凹不多说，手书两个大字：“狂涛”。

文化学者余秋雨从文化层面总结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新疆文学的地位肯定高于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相信新疆这块地方，或者比新疆更大的地方是中华文化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然后改变自己存在本质的一个前沿。我想周涛的意义就在这儿，他把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时间意义上的一种力量和他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力量组合起来了，组合在一个生命体上，变成了一种当代话语。而这种当代话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而由于它通过自己的生命来体现，所以一直保持着一种高贵。”

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殷实评述周涛说：“他没有在各种涌动于这个时代的艺术思潮、文化变迁中惊慌失措，他从未忘记用自己的双眼注视自己脚下的土地”。

周涛的诗与散文，其文学上的实质意义，就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融合起来的当代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冲击。周涛的诗和散文，由内向外张扬着一种西域大漠的生命活力和宏大气势。特别是他的长篇散文，把汉字的搭配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洋溢着高度浪漫主义的文采和大写意、大抒怀，豪放粗犷，雄奇刚直，对中国白话文运动以来植根于母系文明阴柔婉约的文坛之风，予以强劲的扫荡与洗礼。

部队文艺团体如何更好地为兵服务，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客观地说，在为兵服务这个问题上，所有部队文艺团体都是不含糊的。无论在广袤内陆、中原大地，还是高山海岛、大漠荒原，只要有部队驻扎的地方，不管单位大小官兵多少，都曾留下过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活脱身影。许多文艺单位和艺术家，常常把为兵服务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踊跃地深入到部队基层去，在为部队演出服务的实践中履职尽责，实现自身的真正价值。为兵服务作为一种优良传统和作风，一直被部队各个文艺团体坚持着，延续着和发扬着，为此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洒下了无尽的汗水，也涌现出不少动人的事迹。甚至可以说知难而进的部队文艺团体，在以一种近于悲壮的行进，来续写着一种恒久的业绩和荣光。

然而，一个不能不承认、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真切地摆在了所有部队文艺团体的面前，即为兵服务这种神圣的使命，在当前遇到了极大的难题和困境。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基层部队不再像早先那样，听说演出队伍的到来就欢欣鼓舞，欢呼雀跃，而常常是以种种理由推三阻四不愿接待，使文艺团体下部队演出有些难为继。其中原因为什么在于，各部队这些年来在文化设施上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通过电视、网络和下发光盘等多种途径和方式，能够迅速及时地观看到各种高水平、高质量的节目。因此，有的部队对一般水准的真人秀的演出不大看得上眼，如果一支演出队伍中没有明星大腕，就干脆以训练战备任务忙为由婉言谢绝。当然，为兵服务中的经费问题，也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部队接待演出的经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多属于预算外的支出，这也是部队不乐于热情接待文艺团体的考量因素之一，使得下部队演出难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一些文艺团体为完成规定的下部队演出场次，竟到了需要找熟人托关系，才可能被安排、被接待的地步，这使部队文艺团体为兵服务的的热情和积极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挫伤。

如果从部队文艺团体自身来找原因的话，在为兵服务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上，无论是观念、内容和方式，都出现了相对滞后的状况。今天部队的兵员构成和文化条件，早已不同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和平建设时期，甚至与10多年前都有了天壤之别。部队的文化设施，官兵的欣赏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我们为兵服务的思路还基本上停留在过去的模式上，几十年来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变化。一次次大张旗鼓或轻装简从的下部队演出，拿给官兵看的节目，如果演出内容小基础条件，节目滞后于生活现实，引起官兵多大的观赏兴趣，接不通与部队官兵思想情感的血脉，遭到冷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当然，还有一个必须承认的现象是，在部队文艺团体中，也有少数人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其为兵服务的意识比较淡薄，并不把为兵服务作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和第一位要求。具体表现为其眼睛只盯着名利与金钱，只盯着光彩夺目的大舞台，热衷于追求出大名获大奖，对下部队演出不大上心。更有甚者是缺乏自律，作出某些不名誉的事情，甚至对破坏军队文艺团体的声誉也在所不惜。有的对单位布置的任务拒不承担，并且动不动以离开部队相要挟。有的人是冲着军队文艺团体响亮的金字招牌来的，伸手要各种名利和待遇，等到愿望和要求满足之后，则将为兵服务置之脑后。有上述种种表现的虽然是少数人，但影响是极为负面的，是与军队文艺团体的职能背道而驰的，也招致了人们对部队文艺团体的种种非议。

尽人皆知，部队文艺团体为兵服务观念和意识的树立，源自于一种可贵的优良的传统和精神的遗产。部队文艺的本质是战斗的文艺，是伴随着战争生活诞生和发展的。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文艺工作者与战士一起投身战斗，出生入死、并肩作战，血与汗、生与死都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那种时代的为兵服务是最直接的，所创作的作品就孕育诞生在战斗的刀光剑影之中，用直白的、明确的、生动的，而是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内容和形式，在战争的进程中，产生着无比巨大的激发斗志、凝聚军心的力量，起着无可估量的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作用。同时，以文艺演出服务的方式，对我军血染染战场的战士，起到缓解压力和精神抚慰的作用。这样的文艺实践表明，部队的文艺是最贴近战争的创作，也是最贴近部队的服务。

回想起来，从我军文艺的发轫之日到今天，我们这支军队所创造的文艺成果是十分辉煌的，也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比拟的。在8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所有曾在这支队伍中创造和奉献过的文艺家们，无不感受到作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光荣和责任，也无不以巨大的热情和才智投身创作和演出。因此在我军的各个文艺门类，才会涌现出大量脍炙人口，可以当之无愧代表国家和平和精神气魄的作品，并且始终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军官兵的欢迎和推崇。出自部队文艺工作者之手的作品，丰富、壮观、深厚和辉煌，是民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力地感染和激励这支奋进中的军队，也对凝聚民族精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的部队文艺，无疑可以进行史的书写。

要客观地审视我军文艺自身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认真思考我军文化工作独特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虽然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总人数，从编制上说已经缩小到历史最低点，由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多时的6万之众，锐减到今天的不足2000人的编制，差不多到了1/30的程度，这已经是一支少而精的队伍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在国家和社会举办的各种门类的文艺活动中，都能看到部队艺术家的身影，而且常常是摘金夺银，十分引人注目。令人必须深思和注意的是，在各类评奖比赛的竞技场上，特别是在广受关注的电视荧屏，似乎总有一些穿军装的文艺工作者在一展身手，在为部队争得某些荣誉的时候，却给人以部队的文艺兵过多的印象。这说明一个道理，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人数少却影响大，表明文艺的确不同于其他职业和角色，其影响有着无可估量的倍增效应，无论是好的或不好的方面都可能被放大。

要客观地审视我军文艺自身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认真思考我军文化工作独特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虽然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总人数，从编制上说已经缩小到历史最低点，由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多时的6万之众，锐减到今天的不足2000人的编制，差不多到了1/30的程度，这已经是一支少而精的队伍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在国家和社会举办的各种门类的文艺活动中，都能看到部队艺术家的身影，而且常常是摘金夺银，十分引人注目。令人必须深思和注意的是，在各类评奖比赛的竞技场上，特别是在广受关注的电视荧屏，似乎总有一些穿军装的文艺工作者在一展身手，在为部队争得某些荣誉的时候，却给人以部队的文艺兵过多的印象。这说明一个道理，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人数少却影响大，表明文艺的确不同于其他职业和角色，其影响有着无可估量的倍增效应，无论是好的或不好的方面都可能被放大。

始终牢记为兵服务的宗旨

□汪守德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在这样一种媒体极为发达的时代，似乎难有生活的死角可以不为人知。身为部队文艺队伍的人，确实应当更加自重、自持、自律。那种为兵服务的意识淡化，而煞费苦心甚至不择手段想在荧屏露脸，以期扩大知名度的做法，并不可取。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知名度是不言而喻的，但凡有点知名度的人，又很容易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下，接受舆论的监督和批评。任何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任何一个部队文艺团体，都应时刻想到自己的身份，都应想到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只看到光鲜出彩的一面，更不能只漂在远离基层的上面，浑然不觉地穿着军装到处招摇。以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身份参与的活动，要看到既可能给自己带来荣誉，但任何不当的言行也可能给部队和文艺工作者形象带来损害。

对于整个部队文艺团体而言，的确有一个怎样适应变化、与时俱进的问题，但作为一种政治和文艺遗产，部队文艺有其沉重的分量和不可舍弃的理由。我军作为一支担负现代作战任务的武装集团，仍然需要以文艺的方式来为其服务。这种服务或许可以广泛利用全社会的丰富资源。我们这样一支军队的特殊性质，决定其需要有自身的政治工作，而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又是最懂得、最擅长以最形象、最具艺术化的手段，来加以体现和表达的。

急迫之处在于，部队文艺团体履行为兵服务的职责和使命，有一个怎样适应新情况、新形势、新局面的问题。而这是需要以极大的热情和心智，进行认真审视、重新定位和深入探索的。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和军队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完全习惯于采用过去那一套一成不变的为兵服务模式，肯定行不通的。即便是勉强完成了所规定的演出场次，从根本上讲并没有多少意义，而且从场次上讲其中有多少水分，这种服务又有多少实际的作用，都是不言自明的。虽然真人秀的现场演出这种最为传统的服务方式，不能一概否定和放弃，但更应从新的角度来拓展为兵服务的思维，即下功夫专门对此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总结出好的和活的方法和经验，找到既能很好适应又能很好变通、与时俱进的思路与途径来，从而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和形象面对当代官兵。